

# 義大利紅色革命的風潮（一九一九～一九二〇）

熊自健

## 一、革命形勢高漲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歐洲的舊秩序瓦解。大戰中與大戰後俄國羅曼諾夫王朝、德意志第二帝國、奧匈帝國崩潰，蘇維埃政權應運而生。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國際」在莫斯科成立，號召世界革命<sup>①</sup>。義大利雖然在戰爭中贏得勝利，但在戰後却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紅色革命的浪潮，一天天高漲。

義大利在這次戰爭中有五十萬人喪生，五十萬人殘廢，百萬人受傷；生活費用上升六倍；工農生產大減，須仰賴進口穀物與原料維持民生；政府財政赤字從兩億一千萬里拉（一九一三年）暴漲到兩百三十億里拉（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更嚴重的是，政府官員與將領在前線戰場上為鼓舞士氣所許下的種種諾言，都無法兌現，引起民心動盪<sup>②</sup>。

戰後義大利首先發動革命行動的人，是作家鄧南遮（G. D'Annunzio）；他號召羣衆收復義大利人占多數的費烏姆港（Fiume）。鄧南遮組成一支包括民族主義份子、退役軍人和冒險者的志願軍，他們於一九一九年九月攻占費烏姆港。鄧南遮在該港所採用的若干政治設計、符誌與他所表現的意識型態，日後多為法西斯黨所採用。義大利於一九二〇年與南斯拉夫訂立拉巴洛條約，承認費烏姆為自由市。鄧南遮則向義大利政府宣戰，後來義大利政府動用海、陸軍始迫使鄧南遮退出費烏姆<sup>③</sup>。

註① 關於俄國十月革命、德國革命、匈牙利革命的情形與第三國際成立的經過，請參閱鄭學稼，《第三國際史》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七年出版。

註② J. M. Cannett, *Antonio Gramsci and the Origins of Italian Commun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65.

註③ 王曾才，《西洋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增訂版，頁一二四五。

鄧南遮的革命行動宣告了一個革命時代的來臨，爾後義大利爆發出形形色色的革命。日後成爲義共領袖的葛蘭西（A. Gramsci），深刻地指出了鄧南遮獲得民衆歡迎的原因及其影響：(1)義大利人民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和小知識份子對政治根深蒂固的冷漠態度，爲各種冒險行徑打開了方便之門，使各種冒險份子得以乘機招募數以千計的追隨者，特別是在警察當局放任自流、束手無策，或者僅僅作出軟弱無能的反應的時候。(2)它說明義大利沒有羣衆政黨的傳統。義大利無任何一個黨能對素來強烈的、難以駕馭的人民情緒進行指導及進行歷史的和政治的領導。(3)它說明義大利在戰後形勢混亂不安。因爲飽嘗歷時四年的戰爭災禍之後，成千上萬的人在精神、社會方面成爲「流浪者」，失去了精神支柱，他們貪婪追求的不復是國家秩序要求的精神，而是自行其事。(4)透過這些暫時的、偶然的因素，似乎還應該看到一個更深刻、更久遠，同義大利人民一貫的特質相聯繫的因素，即對聰明才智、對才華橫溢者所具有天真無邪而又近乎狂熱的崇拜；這是同義大利人的文化民族主義相吻合的。鄧南遮集這些情感之大成。從極左到極右，無一不在鄧南遮的身上找到知音；何況鄧南遮本人又被普遍地認爲是義大利最富才華的人<sup>④</sup>。

在鄧南遮的革命行動同一時期，義大利無產階級也發動數以千計的暴動，其中最重要的有：(1)一九一九年七月國際大罷工，以支持俄國與匈牙利的蘇維埃政權；(2)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大罷工，抗議民族主義份子攻擊義大利社會黨的議員；(3)一九二〇年四月皮德蒙省（Piedmont）大罷工，對抗政府當局圍剿都靈（Turin）「工廠委員會議」運動；(4)一九二〇年八月，米蘭爆發工人佔領工廠運動，九月，該運動遍及北義大利。一九二〇年是義大利無產階級暴動最激烈的一年，共發生罷工與停工事件兩千餘起左右，紅色革命的浪潮高漲到頂點<sup>⑤</sup>。

此外，墨索里尼（B. Mussolini）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在米蘭組成第一個法西斯戰鬥團（Fascio di Combattimento）。墨索里尼糾合失望和失業的知識份子、退伍軍人與小資產階級共同對抗紅色勢力。當時地主階層因恐農民奪地，資本家因懼失去對工廠的控制，故都同情法西斯黨，暗中予以資助。於是墨索里尼在警方縱容下以恐怖行動破壞社會黨的組織，阻止工人示威遊行，燒打工會，暗殺議員、法官和社會黨活動份子。義大利社會內各階級間的鬭爭，日益尖銳。葛蘭西分析當時的形勢，寫道：「在義大利，階級鬭爭的現階段是一個先導階段，隨之而來的階段若不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便過渡到可以重新提高生產力的新的生產和分配方式，便是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更殘酷的反動統治。爲了迫使工業和農業無產階級從事奴隸般的勞動，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將不惜採取一切暴力手段」<sup>⑥</sup>。

註④ 葛蘭西，〈義大利人民的特徵〉，收編在《葛蘭西論文學》，北平人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頁1110~111。

註⑤ See G. Williams, *Proletarian Order* (London, Pluto Press, 1975).

註⑥ A. Gramsci, "Towards a Renewal of the Socialist Party", ed in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7) p. 191.

然而義大利社會黨是如何面對戰後動盪不安、波濤洶湧的革命形勢呢？

## 二、社會黨內的分歧路線

戰後義大利社會黨是義大利最大、最有勢力的政黨。一九一八年九月義大利社會黨在羅馬舉行大會，頒佈「最高綱領」，試圖調合黨內的「改良派」與「革命派」。可是歐洲左傾的潮流與義大利境內革命形勢高漲，導致義大利社會黨逐步分裂成幾個壁壘分明的派系，各自高舉著不同的社會主義旗幟，從事社會主義運動。其中最重要的有：(1)屠拉梯(E. Turati)、拉薩里(C. Lazzari)所領導的「改良派」，他們控制了各勞動協會和產業聯盟的中央機構、合作社，以及大部份市政府和議會中的社會黨議員。(2)塞拉蒂(G. M. Serrati)領導的「最高綱領派」，他們掌握了社會黨的機構和黨的機關報《前進》(Avanti!)。(3)波爾迪加領導的「棄權派」，他們建立了一個幾乎遍及整個義大利的棄權派組織，並且得到青年聯盟領導的有力支持。(4)葛蘭西領導的「新秩序派」，他們活躍於義大利的工業重心都靈，也獲得「第三國際」與文化界人士的支持<sup>①</sup>。分別簡要說明各派的路線如下：

義大利社會黨「改良派」，基本上認為戰後義大利雖然動盪不安，但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尚未成熟，義大利社會主義運動必須經由議會民主制來進行。該派熱心恢復義大利的民主制度，並且贏得一九一九年九月的大選。社會黨在此次大選中獲得二百萬張選票，一五六個席位；而天主教人民黨獲得一〇三席，其他沒有政黨背景的自由派，獲得九十三席，激烈派獲得五十八席。由於義大利社會黨無法組聯合政府，又拒絕加入天主教人民黨與自由派的聯合內閣，議會路線受到嚴重地挫敗。更令社會黨人士着急的是，議會根本無力制止法西斯黨破壞社會黨的各種暴力活動。

義大利社會黨「最高綱領派」，是以推動社會黨一九一八年九月羅馬大會的最高綱領而得名。他們是義大利社會黨的主要力量。他們認為戰後義大利正面臨經濟困難，國家權力衰弱，工農不滿情緒日增，所以革命將無法避免。他們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鼓舞，主張實施「無產階級專政」；但他們並沒有學習列寧職業革命家黨的組織與鬭爭策略。他們不但沒有與改良派決裂，還試圖與改良派的活動結成同盟。這種曖昧不明的革命概念很快地被無產階級拒絕，最高綱領派亦途窮而逐漸分崩離析。

當義大利社會黨內的改良派與最高綱領派都束手無策坐失良機時，波爾迪加於一九一九年十月正式宣告成立「棄權派」，堅決反對議會路線，棄權於選舉。波爾迪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是個激進份子，撰文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認為它是帝國主義戰

註① J. M. Cammett, *op. cit.*, pp. 68-69.

爭。一九一七年八月，他在佛羅倫斯（Florence）成立社會黨「革命不妥協派」，提倡革命，反戰、反工會組織與活動、反改良主義。俄國十月革命後，波爾迪加鼓吹學習俄國經驗，以列寧為師。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波爾迪加在拿波里（Naples）發刊《蘇維埃週報》（*Il Soviet*），同時部署全國性的棄權派組織，並獲得社會主義青年聯盟的支持。一九一九年十月，義大利社會黨棄權派正式成立，其基本主張為：

(一) 堅持暴力革命，反對議會道路。棄權派認為除非放棄議會活動與清除選舉主義者，否則就不能建立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因為西方式的議會民主是打擊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最強有力的武器。義大利社會黨總是為了競選活動而耗盡了力量，却無心力去準備革命工作，進行革命的宣傳。因此在當前義大利的形勢下，社會黨必須切斷與議會民主制的接觸，並且貶低議會民主制的價值<sup>⑧</sup>。義大利社會主義者必須認清義大利與俄國革命形勢有所不同，義大利的議會民主遠較俄國穩固，義大利社會主義者不能盲目地模仿俄國革命經驗去參加議會活動，結合合法與非法的政治活動，來促進革命形勢高漲。參加議會活動，只會削弱義大利革命的力量，所以必須完全放棄議會道路，堅持暴力革命路線<sup>⑨</sup>。

(二) 建立一個堅強純粹的革命政黨來領導革命活動。棄權派應效法列寧組織職業革命家黨，把義大利共產主義者從社會黨內分裂出來，另行組共產黨；制訂權威性的革命綱領與策略，領導無產階級進行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動<sup>⑩</sup>。在對抗資產階級政權中，唯有建立一個由共產主義者組成的無產階級政黨才能贏得政治權力，並在奪取政權後實施無產階級專政與蘇維埃制度<sup>⑪</sup>。

(三) 仿效蘇俄實施無產階級專政與政經分離的蘇維埃制度。棄權派一再強調蘇維埃制度是依據政治與經濟分離的原則，也就是說行政組織與生產組織是兩套系統。生產組織是以工廠與農場為單位，企業管理實施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由工廠代表、三分之二由最高經濟機構代表、三分之一由工聯代表組成。行政組織以地區為單位，城市每一千人選一名代表，鄉村每一百人選一名代表，組成地方蘇維埃，接管行政工作，再由地方蘇維埃選舉產生上級的蘇維埃，以此類推，直到最高蘇維埃<sup>⑫</sup>。

棄權派的革命綱領震驚了義大利的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更加刺激有產者資助法西斯黨。然而義大利社會黨棄權派只憑主觀的革命願望高唱革命，却無法突破革命的難題，如工農聯盟、武裝暴動、理論鬭爭……。於是該派脫離義大利社會黨另組共產黨

註⑧ 「義大利社會黨棄權派致第三國際的信」，收編在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Part IV Bordiga's Polemic*, pp. 208-209.

註⑨ *Ibid.*, pp. 212-213.

註⑩ *Ibid.*, pp. 210-211.

註⑪ *Ibid.*, p. 214.

註⑫ *Ibid.*, p. 204.

，繼續未完成的革命工作，成爲棄權派唯一能走的路了。

義大利社會黨的「新秩序派」是以《新秩序》週刊而得名。他們人員雖少，却是最具有理論基礎與創造活力的隊伍，對於日後義大利共產黨的影響也最大。一九一九年五月葛蘭西、塔斯卡（A. Tasca）、陶里亞蒂（P. Togliatti）、泰拉奇尼（U. Terracini）在都靈創辦《新秩序》週刊（*L'Ordine Nuovo*），它最先以無產階級文化性質的雜誌問世<sup>(13)</sup>。葛蘭西從第七期起，接掌編輯職務，創出獨樹一格的革命理論與實踐，把《新秩序》轉變爲都靈工人運動的指導刊物。其基本路線爲：

(一)號召成立工廠委員會。葛蘭西認爲馬克思的著作並不是一種廉價的學說，馬克思不是拋出一連串專斷的命令和不容爭辯的、絕對的、超越時空範疇的、準則式的、醒世格言的救世主。他的唯一專斷的命令和唯一的準則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從無產階級主體性出發，在工廠組成自治的工廠委員會，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起點與基礎。工廠委員會是蘇維埃的基層組織，無產階級應在其中顯示自己富有建設性的政治才幹，表明自己有能力建立一個新社會；無產階級應在其中訓練自己的領導能力，以便領導一切有用的人，以建立一個新社會；並且與農民、知識份子和一切自食其力的人共同建立一個沒有剝削的社會。無產階級應在工廠內部確立自己的權力，把自己有組織的活動置於生產力的發展過程中，以此向全社會表明它有能力重建一個新的國家<sup>(14)</sup>。

工廠委員會以民主的原則組成。選舉系統依據各工廠的大小而定，理想的情形是每十五個工人選出一名代表，同時依工作性質分成若干範疇，如技術工人、書記工作員、操作員等……選出不同的工人代表。工廠委員會是工人學習政治與管理經驗的學校，它將改變工人的精神狀態，使工人在日常生活中，具體地、自覺地、主動地、集體地、整合性地獲取知識、文化教養以及管理能力<sup>(15)</sup>。因此，工人將有新的生活方式。工人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是一個公民與勞動者，必須在勞動市場與自由競爭之下工作。而在工廠委員會下，將給予工人以生產中的直接責任，形成一個自覺自願的紀律，創造一種生產者的心理，即他們不再是爲統治階級的利潤而勞動，而使勞動本身成爲創造歷史的主體力量。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與歷史的消極客體，而是成了它的主體<sup>(16)</sup>，同志的概念替代了公民的概念<sup>(17)</sup>。

註(13) J. M. Cammett, *op. cit.*, p. 72.

註(14)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pp. 65-66.

註(15) *Ibid.*, pp. 67-68.

註(16) *Ibid.*, pp. 73-75.

註(17) *Ibid.*, p. 100.

(二) 提倡工農聯盟。葛蘭西指出在未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內，城鄉彼此分離的情形相當普遍。如果只在城市裏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那麼革命並不是建立在一個穩固又廣大的基礎上。革命必須由城市向鄉村進軍，並且在鄉村建立由貧農組成的社會主義機構，由城市向鄉村投入大量的資本，轉變農業經濟的面貌，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sup>⑯</sup>。葛蘭西又進一步論述如何在義大利落實工農聯盟：「義大利北方的資產階級征服了義大利南方和諸島，並使它們淪為被剝削的殖民地。北方無產階級在把自己從資本主義奴役下解放出來的同時，必將把南方農民羣衆從北方的銀行和寄生工業的奴役下解放出來。農民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復興，不應依賴於分配荒蕪的或不利耕種的土地，而應依靠工業無產階級的支援。而工業無產階級也需要農民的支援，致使義大利南方和諸島不致變成資本主義反革命勢力的軍事基地……工人們在摧毀工廠的專制制度，打碎資本主義壓迫人民的國家機器和建立工人國家的同時，必須將砸碎一切把農民束縛在貧困和絕望境地的鎖鏈。無產階級建立了工人專政，掌握了工業和銀行，就能夠利用國家機器的巨大力量來支持農民向地主、自然界和貧困進行鬭爭。無產階級將資助農民，建立合作社，保障人身安全，保護財產免遭掠奪，並將興建改良灌溉工程。無產階級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發展農業生產正符合它們的利益，是因為贏得和保持住農民羣衆的支援正符合它們的利益，是因為工業生產有利於和平、有利於拉近城鄉之間和南北兩方之間的和睦關係正符合無產階級自身的利益」<sup>⑰</sup>。

(三) 革新社會黨。葛蘭西從一九二〇年後積極地把矛頭指向社會黨，他批評社會黨沒有成功地在羣衆中建立一個長久堅固的機構，也沒有建立一支軍事性的力量贏得政權<sup>⑱</sup>。社會黨只像是一個監察官在注視著義大利境內各種事態的發展，它從不依據馬克思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的理論，針對時局發表意見、提出口號、制訂路線，聯合並集中革命行動。戰後的社會黨仍僅僅是一個議會政黨，只在窄小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範圍內活動，它只關心統治階層膚淺的政治宣言。社會黨雖然加入「第三國際」，但它並沒有清除黨內的改良派，也沒有以共產主義教育羣衆。它沒有教導義大利工人明瞭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是國際性的運動，每一個單獨性事件，必須從世界革命的眼光來考量。義大利社會黨更沒有與其他歐洲國家的革命政黨取得聯繫。葛蘭西認為必須革新社會黨，把它從小資產階級議會政黨革新為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並努力經由工人國家來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社會。他進而表示要清除非革命、非共產主義者出黨！社會黨的領導階層不能由各派的領袖們湊成，來維繫黨形式上的統一與派系間的平衡，而必須由能盡全力發展工人的革命力量的領袖組成，以制訂革命政府的政綱<sup>⑲</sup>。

註<sup>⑯</sup> *Ibid.*, pp. 83-87.

註<sup>⑰</sup> *Ibid.*, pp. 148-49.

註<sup>⑱</sup> *Ibid.*, p. 154.

註<sup>⑲</sup> *Ibid.*, pp. 190-96.

四提高無產階級的文化水平。《新秩序》週刊除了刊載政治問題之外，有關義大利歷史、藝術、文學、無產階級道德、教育和技術等問題也都提出來加以討論，並且在羣衆中廣泛地傳播。《新秩序》週刊恢復了馬克思主義完整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本來面目與活力。

新秩序派的革命路線在義大利境內與社會黨內還沒有廣泛地受到重視與瞭解，只在都靈市展現出它的影響力。當都靈市「工廠委員會議」運動失敗之後，新秩序派也趨於瓦解。塔斯卡公開表示他不同意關於工廠委員會的理論與實踐，要求回到傳統的工作階級組織去；泰拉奇尼與陶里亞蒂則靠近最高綱領派；葛蘭西只得獨自地把精力花在促進工廠中的共產主義教育團體上面。

義大利社會黨在戰後形成四個派系與分歧的路線，彼此間相互批評，爭奪地盤，以致削弱社會黨的力量，無法匯聚為一個強有力的黨來掌握義大利無產階級紅色革命的風潮。義大利的法西斯戰鬥團、資本家、地主與自由派的齊奧里蒂（G. Giolitti）聯合內閣，則齊力收拾危局，暫時地平息了戰後義大利的騷動。

當一九二〇年九月北義大利無產階級正熱烈地進行工廠占領運動之際，齊奧里蒂趕往都靈市，以高度妥協性的手法調解衝突，要求「工會」與資本家的「工業聯合會」合作，平等地組織「混合委員會」，對政府建議與革事項，准許工人代表參加工廠內有關技術、財政和行政等方面的管理。並且補發工人在工廠占領期間的薪水及增加工資。工人接受了這項條件，退出工廠、恢復工作。義大利戰後的紅色革命開始退潮，社會黨的革命派份子以及「第三國際」更加覺得有必要脫離社會黨另組共產黨。

### 三、「第三國際」與義大利社會黨的分裂

「第三國際」成立之後，義大利社會黨立即給予熱烈的支持。一九一九年六月義大利社會黨鼓動工人參加國際大罷工以支持蘇維埃政權。同年十月，義大利社會黨在波洛那（Bologna）召開大會，通過了參加「第三國際」的決議。同時波爾迪加成立了棄權派，號召另組共產黨與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義大利大選之後，列寧寫信給塞拉蒂，要義大利社會黨「避免進行未成熟的革命」。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間，列寧寫《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痛斥歐洲幼稚的左傾盲動潮流。其中點名批評塞拉蒂容忍義大利社會黨內屠拉梯之流的機會主義者是錯誤的；也指出波爾迪加等人認為參加議會都是有害的，因而拒絕參加議會此一思想的錯誤。

列寧認為拒絕參加議會之所以是犯了幼稚病，就是因為他們想用這種簡單的、容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來解決在工人運動內部消除資產階級民主之影響力這一困難任務。列寧並且提出原則性的鬭爭方針：共產主義運動不僅應在議會這一活動場所，

而且應在一切活動場所提供新的原則及與「第二國際」之傳統完全不同的東西<sup>②</sup>。

一九二〇年六月，即在「第三國際」召開二全大會前，列寧邀請義大利社會黨代表團到克里姆林宮，塞拉蒂在報告裏強調，義大利社會黨和俄國革命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並要求國際執委會信任義大利社會黨。在「第三國際」二全大會上，塞拉蒂在殖民地和民族問題、土地問題、開除屠拉梯問題、加入「第三國際」二十一項條件、英共加入工黨等問題上，反對列寧。而波爾廸加却大力支持列寧，只在議會鬭爭問題上才與列寧相左。其中關係義大利社會黨最為重要者，莫過於廿一條加入「第三國際」的條件。廿一條的要點是：共產黨的組織要按照民主集中主義的原則，黨應進行合法的和非法的活動；國會議員受黨團的控制，而黨團又受黨中央的控制；報刊要絕對受黨的指揮；對軍隊和農村進行宣傳；排斥中間派和右派的社會黨人；與改良主義者、「第二國際」和阿姆斯特丹工聯決裂；改黨名為「共產黨」等。義大利社會黨代表團答應召開一個特別會議來討論義大利社會黨是否同意廿一條和開除改良派的問題<sup>③</sup>。此外，「第三國際」二全大會上認為，義大利社會黨都靈支部在《新秩序》週刊上對義大利社會黨的建議是正確的<sup>④</sup>。「第三國際」二全大會後，列寧已決定支持波爾廸加和葛蘭西另組共產黨。

當一九二〇年八月義大利無產階級熱烈進行占領工廠運動時，「第三國際」寫信給義大利社會黨中央和全體黨員。信中指出：義大利有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可是在許多場合，社會黨却站在旁邊。這根本的原因在於黨內有無產階級的敵人改良主義者和有產份子。「第三國際」執委會認為義大利社會黨必須提出清黨問題，否則義大利支部在世界無產階級面前就不能負擔責任<sup>⑤</sup>。九月二十二日，「第三國際」執委會主席季諾維也夫（G. E. Zinoviev）在致義大利無產階級的公開信中，要求義大利無產階級升高擴大鬭爭的層次，也就是要奪取政權，推翻資產階級，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信末句是：「肅清叛徒和改良主義者」<sup>⑥</sup>。九月二十八日，義大利社會黨領導階層，終以七對五票通過接受加入「第三國際」廿一條條件。十月義大利無產階級紛紛回到工廠，恢復工作。而義大利社會黨分裂的命運已不可避免。

一九二〇年十月底，義大利社會黨內的共產主義份子在米蘭集會，準備為即將來臨的大會起草綱領，並開除改良主義者。會後發佈宣言，他們將把義大利社會黨轉變為一個新的、高度權力集中的黨，改名為義大利共產黨（「第三國際」支部）。簽署這份宣言的人物有葛蘭西、泰拉哥尼、本巴奇（N. Bombacci）、波蘭廸加、福蒂基亞里（B. Fortichiarri）、米西亞諾（F.

註<sup>②</sup>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四卷，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頁二二〇～二二一，頁二六一～二六五。

註<sup>③</sup> 參閱鄭學稼，〈第三國際史〉上冊第五章。

註<sup>④</sup> 同註<sup>③</sup>，頁三一三。

註<sup>⑤</sup> 同註<sup>③</sup>，頁四六一。

註<sup>⑥</sup> 同註<sup>③</sup>，頁四六一。

*Misiano*)、波拉諾(L. Polano)、雷波西(L. Repossi)。這些人物日後成爲義共中央委員。此外，許多最高綱領派的左翼份子在稍後也宣佈接受該項宣言<sup>㉗</sup>。義大利共產黨於焉已有雛形。

義大利社會黨內最堅決反對分裂的是塞拉蒂。俄國十月革命以來，他雖然堅定地支持莫斯科，但却努力護衛社會黨改良主義者，基本上他認爲義大利社會改良主義者與其他國家的改良主義者不同，他們能接受階級鬭爭、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等理論。他們對於義大利革命是不可缺少的一環，因爲他們擁有大量的羣衆與地方政府機構，這是不可失去的力量。同時塞拉蒂亦基於道德上的責任，而不忍親手破壞義大利社會主義運動的傳統，把勞苦功高的領袖們逐出門牆。因此他始終捍衛改良主義者、斥責「第三國際」不能瞭解義大利社會黨的情況。然而塞拉蒂在理論上却是軟弱的，他無力反擊列寧獻身說法的威力，尤其是列寧一再咄咄逼人地論斷義大利社會黨如有更高的權力集中與更嚴的紀律將更能贏得革命的成功<sup>㉘</sup>。列寧深切地瞭解塞拉蒂的威望與影響，遂毫不留情地佈置打擊塞拉蒂的計謀，預計在一九二一年初義大利社會黨大會上排斥塞拉蒂，順利組成義大利共產黨<sup>㉙</sup>。在戰後兩年，義大利紅色革命風潮漫漫社會各階層，法西斯黨與一個新的義大利共產黨即在暴風雨中誕生。從革命的經驗中吸取教訓，是義大利共產主義者向前邁進的第一步。

註<sup>㉗</sup> J. M. Cammett, *op. cit.*, p. 136.

註<sup>㉘</sup> *Ibid.*, pp. 134-35.

註<sup>㉙</sup> 參閱鄭學稼，《第三國際史》上冊，頁四六三～四六五。